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2号(总194号)

2015年4月17日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 包容性发展政策框架的议程

内容摘要：2015年3月21-23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承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会”在北京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为了倾听国外的专家学者对中国发展的意见和建议，我们邀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为本届论坛撰写了背景报告。

斯蒂格利茨教授认为，随着中国进入下一阶段，铭记经济学家从增长和发展历程研究中吸取的重要教训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国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所带来的风险，即认为自己必须而且能够保持快速增长，从而缩短自身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必须确保自身发展具备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同时必须确保这种增长具有包容性，即广泛分享增长红利。

关键词： 中国特色；包容性发展；政策框架；议程；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包容性发展政策框架的议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¹

随着中国进入下一阶段，铭记经济学家从增长和发展历程研究中吸取的重要教训非常重要。尤其是，中国需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所带来的风险，即认为自己必须而且能够保持快速增长，从而缩短自身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距。中国必须确保自身发展具备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性，同时必须确保这种增长具有包容性，即广泛分享增长红利。

中国开始进军市场经济之初就明确指出，力求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也就是说，它并不满足于模仿别国已经采用的经济模式。在中国启动市场经济转型的三十多年里，其努力定义自身道路的理由变得越发清晰。

(a) 2008 年，人们开始清楚地看到某些貌似强大的经济体其实是建立在一盘散沙的基础上，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建立在堆积如山的不可持续的债务基础上。还应该清楚地看到，市场本身既不稳定也不高效，而且，那些受金融部门特殊利益影响最严重的市场经济体表现最差——它们声称放松管制和自由化有诸多好处，这种做法是自私之举。²

(b) 按照传统的方法测量，一些国家的确出现过增长，但绝大部分增长红利都被上层获得（如美国），以至于普通公民的情况比二十五年前还要糟糕。我曾经指出，这种不能为大多数公民谋福利的经济制度是一个失败的经济制度。中国不应模仿这样的制度，事实上，它应该研究导致这种不利后果的原因，并力求加以避免。³

(c) 我们在过去 35 年里还意识到，不受约束的市场会给环境以及我们的公民甚至地球的未来带来风险。我们已经见证了人类破坏环境的力量，埃克森在瓦尔迪兹、BP 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就是例证。

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² 作者在自著的《自由落体：美国、自由市场以及全球经济的沉没》（纽约：W.W. Norton，2010 年）中对此作了深入讨论，此书已由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成简体中文。

³ 作者在自著的《不平等的代价：今天的分裂社会如何威胁我们的未来》（纽约：W.W. Norton，2012 年）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此书已由中国机械工业出版社翻译成简体中文。

在世界各地包括中国的许多城市里，空气污染（雾霾）已经加剧到威胁公民健康和福祉的程度。最重要的是，全球变暖构成了一种生存威胁，但是一些公司宁愿选择忽视而不是去应对。

(d) 最后，我们在世界各地都已看到，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腐败现象削弱了我们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可信度。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深知自己社会的腐败形式：我曾将通过肆无忌惮的竞选献金公然大规模收买政治支持的行为贴上“美式腐败”的标签。这种腐败行为已将本应基于“一人一票”原则的民主制度转变为一种用“一元一票”描述更为恰当的制度。

这四个问题不仅导致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可信度丧失，还导致支持任何社会和任何政府运转的信任基础遭到破坏。⁴我应该强调的是，腐败侵蚀信任的现象不仅存在于公共部门，也存在于私营部门；当二者有所放任时，信任侵蚀程度尤其严重，这方面的例证包括：公共部门保护环境不力，允许金融部门实施滥用行为，似乎忽视了对市售产品健康与安全问题的关切，以及当上层无论如何不能以其社会贡献证明其收入合法却通过特权地位获取收入时，而不采取任何遏制过度不平等现象的行动；政府部门的强权人物与私营部门的强权人物似乎过于靠近，而他们很少对社会底层的困境有所帮助。

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去了解世界太多国家遭遇这些失败的原因，从而建立一个确保包容性和持续性增长的政策框架。一些国家至少避免了部分此类问题的事实表明，它们并不是不可预防的。事实上，这些习以为常的惨淡结果并非经济或自然法则的无情后果。它们多半是在国家、地方甚至全球层面采取某些政策的结果。这个事实实际上带来了某种希望：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比如中国选择一个不同的政策框架，或许就能实现包容性和持续性增长……这应该成为中国建立包容性增长政策框架的首要关注点，要吸取我刚刚描述的失败教训，确保不会沿袭相似途径。

根本性失败源于不理解两个基本原则。

⁴ 作者在为中国发展高层论坛 2014 年会撰写的论文《中国面临的一些重大社会风险及其应对措施》中阐述了主题。

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适度平衡

每个社会都需要集体行动；随着环境的改变，政府、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的角色也会发生变化。市场已经证明自己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无论是善是恶。市场必须得到管理。或者更准确地说，市场并非在真空中存在。必须有规则和监管，规则和监管必须是强制性的。一旦具备良好的规则和监管，一旦市场得到良好管理，经济就会增长，国家就会繁荣。我们一直在体验缺乏适当规则和监管的市场后果。

规则和监管不可能自我强加；自律不能够也不曾奏效。它们必须来自于政府。

这只是现代经济离开政府无法运转的原因之一。政府需要制定规则，确保一切基于规则进行，保护劳动者、消费者，保护环境不被滥用，纠正我们目前关于无数市场失灵现象——市场无法正常运转的诸多情形——的认识，保护难以照顾自身者。政府还能发挥催化增长的重要作用。事实上，最重要的创新和发现一直是基于政府资助的研究（或基金会支持的研究），而不是由私营部门主导的创新。这里有很好的理论原因：在创新行为的层面和方向上，市场效率低下的原因很多。尽管污染可引发负面外部效应，但研究必然会生成正面外部效应，所带来的好处会远远超过创新者的薪酬。也就是说，在一个制造过多污染的市场里，只会产生极少的创新——尤其是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创新。⁵

有些领域可以通过适当监管实现市场可信度，比如：确保竞争，保护环境、安全、健康、劳动者和消费者。有些领域需要政府发挥更大作用。有趣的是，经济理论表明政府发挥了更大监管作用的领域——如金融市场——一直是最能证实其监管不当和执行不力后果的领域。

一个广泛认同市场单靠自身无法运转的领域，是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尽管政府无法确保完美实现稳定性，但相比放任自流的市场，政府政策还是可以带来较大的稳定性。

未能保持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意味着资源的巨大损失。以美国为

⁵ 更广泛的讨论请见 J. E. Stiglitz 和 Bruce Greenwald 的合著《创建学习型社会：增长、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途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2014 年）。

例，据我估计，2008 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实际损失——经济潜在产出与其实际产出之间的缺口——达数万亿美元。但其后果波及面更广：衰退加剧了该国已经高得令人无法接受的不平等水平。普通公民遭受着工作和家庭损失，他们所依赖的公共项目被削减，劳动力市场的疲软也导致工资减少。危机发生之前，多数美国人的状况都不好，现在的情况更加糟糕，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之后的平均收入低于 25 年前的水平。

不过，近年来显著影响美国的不良后果并不只是危机造成的。即使在危机之前，市场也未能合理配置资源。利率很低，国内资金充裕。央行行长甚至提到了“储蓄过剩”。人们会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强劲投资。但是根本没有。事实上，实际资本存量的增长甚至跟不上资本输出的速度，而输出的资金也过多投入了房地产业，包括在内华达州的沙漠中心建造劣质房屋。⁶ 为了维持经济，美联储和政府鼓励挥霍性的私人消费，不顾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巨大投资需求。尽管美国是当时世界最大的经济体⁷，但它入不敷出，每年都从国外借贷数十亿美元用于维持肆意挥霍。

总之，市场本身的失败不只是因为它们造成了过度不稳定性，还因为它们甚至没有采取必要行动，从而实现有效的资源配置。

不过，即便是有效的市场也并不意味着有可能出现的福利分配是可以接受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讨论中指出了市场的重要不足，也解释了政府必须发挥的重要作用。我谈到了市场和政府之间的必要平衡。一些国家在这一方面犯错，其它国家在另一方面犯错。正如我们现在应该确知的，无论哪一方面的失衡都会造成很大的不良影响。

但是，将自我局限于有关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讨论未免过于简单化。有很多其它的既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私营实体的机构安排。例如，世界最成功的大学就是非营利性的。提供健康服务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在中国，拓展这种社会“部门”的余地很大。

成功的增长和发展需要政府、私营部门和这种第三方部门之间的

⁶ 比如可参见 J. E. Stiglitz 的《‘在个人之间分配收入和财富’的最新理论观点》，该文提交 2014 年 6 月 10 日 -11 日在约旦举行的国际能源署 / 世界银行共享繁荣圆桌会议，拟在会议论文集集中发表。

⁷ 2014 年 9 月，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 PPP（购买力平价）国家。

平衡，但政府有时并没有发挥它们应起的作用。

治理

政府很多时候沦为强势群体不惜以牺牲他人为代价而牟取自身利益的工具。特殊利益畅行无阻。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实际上会加剧市场失灵现象，而不是加以纠正。政府政策实际上会导致更大的不平等。

而且很显然，这些问题几乎在所有形式的政府中均有发生；社会得以保护自身免受侵害的例子少之又少。尽管如此，在某些情况下，这些现象会比其它时候更为常见，也更为严重。

在每个发展阶段和各级政府中，各种新的治理问题都会发生。例如，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企业利益已经在发挥巨大作用。在世界各地的地方政府中，随着土地价值的提高，房地产利益发挥了某种扭曲作用。

一旦决策者未能采取完全适合其预期服务对象的行动，就会出现治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出现方式完全相同。（在私营部门，我们用技术名称指代这个问题：委托代理问题。）一个主要区别是，本应防止滥用行为发生的法律和法规在私营部门受到了更大限制。CEO们不惜以股东和工人的利益为代价，慷慨奖励自己，并声称他们的薪酬是基于业绩，尽管有时他们的薪酬和公司业绩之间并无实际关联——事实上，这种关联甚至会负面的，而他们仍然不会触犯法律。

一些人认为，政府不完美这一事实为反对任何政府行为提供了理由。但是，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即便是不完美的政府，也能给不受约束的市场带来可持续的显著改善。事实上，几乎所有获得成功的国家（在其最成功时期）的政府都发挥过某种重要作用，履行了我们此前描述的职能。

尽管如此，各国社会仍应努力完善针对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治理。多年来，我们已经对这方面的某些关键因素有了深刻认识。

一个基于透明的检查制衡系统是至关重要的。民间社会（包括智库和大学）和媒体（近年来因互联网而得到强化）可以披露滥用现象，并要求私营和公共部门的肇事者为其行为负责。显然，如果缺乏信息，

就很难知道滥用行为是否正在发生。这就是为什么公共和私营部门的肇事者往往倾向于保守秘密。不过，这也正是要依法保障“知情权”和“告知权”的原因。⁸

我最终获得诺贝尔奖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信息的不完善和不对称，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经济运行。当信息不完善时，市场往往表现不佳。一系列问题由此出现——从允许公司获得垄断租金并导致收入和政治权力不平等的不完善竞争问题，到企业负责人不惜牺牲其他利益攸关方（工作人员、股东和社区）利益而利用职位便利将企业资源转化为自身利益的企业治理问题等等。政治领域缺乏透明度等同于经济领域的信息不完善。如果被治理者和治理者之间缺乏信息流动，政治体系就不可能正常运转。知情权法律确保可以获得相关信息；告知权法律确保可以传播一旦获得的信息。

确保公众利益（良好治理）本身就是一项公益事业：如果留给私营部门，将无法充分满足需求。因此，政府有必要鼓励私营部门和民间社会参与这个领域。但与此同时，政府必须在资助和支持智库方面发挥作用。

中国的新常态

中国经历了向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过渡的多个阶段。适合某个阶段的经济模式和政策并不适合下个阶段。事实上，中国正是按照“摸着石头过河”的思路去解决自己面临的阶段性问题，不断迈向下一阶段。只有通过这种持续性变革，中国才得以如此长久地保持自己的卓越业绩。

长期以来，新常态的一些要素已经得到认可：不能保持 10% 左右的快速增长率；需要从“数量”增长转变为质量增长；这将需要经济升级，需要从出口导向型增长到内需导向型增长的经济转型，而创新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保持并且应该保持快速增长：中国的人均

⁸ 有越来越多的文献述及知情权、告知权、良好治理和包容性发展之间的关系。比如可见：R. Islam, 编辑, 《告知权：大众媒体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世界银行研究院发展研究中心，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研究院，2002 年，其中包括本人撰写的章节：“政府的透明度”，第 27-44 页；A. Florini, 编辑, 《知情权：一个开放世界的透明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2007 年，其中有我撰写的全书前言；以及 J. E. Stiglitz, 《论自由、知情权和公开话语：透明在公共生活中的作用》，该文收入《全球化权利：1999 年牛津大赦文献》，Mathew J. Gibney (编辑)，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15-156 页。

GDP 仍然只占美国的 1/5 左右，因此有很大的追赶（包括缩小知识差距）空间。

一些观察到全要素生产率（TFP）低值增长（根据某些来源，最近几年不到 2%）的人认为，中国正面临着自身投资收益的急剧减少递减，因此应该侧重于消费。而一旦提到应该增加消费，所指的往往是个人消费。

我认为，TFP 的低值表明中国在投资分配方面没有发挥应有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存在高水平投资需求，而是意味着中国必须提高投资分配水平。事实上，至少五个领域的（主要是公共）投资需求仍然很大：（1）人力资本；（2）技术/研究；（3）城市化；（4）健康；和（5）环境，包括应对全球变暖的经济改造，以及降低高度的空气和水污染。

请注意，如果要实现具有包容性和持续性的强劲增长，政府需要在这所有五个领域发挥核心作用，尽管在各领域的作用会有不同。

只有借助公共教育体系，才能创建一个有凝聚力的社会，确保所有个人发挥他们的潜力，而不论其父母的收入和教育程度如何。只有借助这样的教育体系，才能确保今天处于特权地位的人无法向其子女传递这些优势。

获得医疗保健被视为一项基本权利。美国已经见证以私营为主的医疗保健体系的失败：与以公共体系为主的国家相比，成本高得多而效果差得多。鉴于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已经如此之高，沿袭美国道路的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中国重视创新的重要性，这是正确的。但创新和健康、教育一样，不能留给私营部门。西方的创新侧重于节约劳动力——结果导致了许多国家的高失业率。中国最迫切的需求是在其它方面，包括保护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鼓励开发太阳能电池板（全世界都已从中受益）是一件好事。（即使经济方向是正确的，以平衡方式进行投资仍很重要：即便是在一个高社会回报区域，也可能出现过度投资。）

即使是在健康等较为狭窄的重点领域，私营部门也并不关注对全社会福祉至为重要的创新领域（如疟疾），而会关注那些能带来最大回报的领域。

未来几年将会出现从农村部门到城市部门的广泛迁移现象。生活

在城市中的人口比例将越来越大，而前提是这些城市适合居住，有良好的公共交通、公园和经济型住房。同样，如果缺乏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社会的积极参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最后，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地看到，私营部门会在政府不作为的情况下导致不可接受的高度污染——空气不能呼吸，水不能饮用。而今天，全球变暖和气候变化给地球的福祉带来了更大的威胁。要解决这些主要由私营部门导致的问题，只能通过政府行为——通常情况下，是进行政府投资。

中国是一个拥有巨大投资需求的庞大经济体，这一事实使中国处于一个有利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有明显充足的需求可以维持高增长率。在这方面，中国的地位明显不同于以前依赖出口主导性增长的其他诸多国家。中国可以过渡到需求驱动型增长。

但是，如果只是把问题留给市场，中国向新常态过渡所需的那种结构转型将不会顺利发生。事实上，市场在实现大的结构转型方面往往表现很差。（它们这种能力低下可以作为大萧条的部分解释，同时也是今天一些西方国家所面临的经济萎靡的一部分。⁹）导致这种失败的原因包括资本市场的完善，从而不能为老部门向新部门的转型提供充足资金。这些问题往往因治理问题而加剧，现有部门利用其政治影响提供支持，力图超越更具活力的新兴部门的影响力，尽管它们的业绩无法超越后者。

在西方，尽管金融部门能够而且应该为这种转型提供便利，但它们更多参与的是往往更加有利可图的其它行动：金融领域的私人回报与社会回报不够一致。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们参与的许多行动都有巨大的社会成本。危机以来，已经就如何防止金融部门将此类成本强加给其他社会群体——从滥用信用卡行为，到操纵市场、过度冒险、反竞争做法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但是，一直很少关注如何确保金融部门真正执行为实现强劲的包容性增长而应该也必须履行的社会职能。我曾经得出结论认为，不仅有必要加强监管——旨在防止非生产性社会活动，鼓励更多的生产性社会活动——而且政府自身必须发

⁹ 我在近期的两篇论文中阐述了这些观点：《流动性制约、生产力趋势和危机扩展》，经济行为与组织期刊，83(3): 375–393；和《部门失衡和长期危机》，发表在《全球宏观经济和金融》，F. Allen, M. Aoki, J.-P. Fitoussi, N. Kiyotaki, R. Gordon 和 J.E. Stiglitz, 编辑，国际能源署会刊第 150-III 期，Houndmills, 英国和纽约: Palgrave, 第 61-97 页（两篇论文均与 D. Delli Gatti、M. Gallegati、B.C. Greenwald 和 A. Russo 合写）。

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过，如果这些政府行动旨在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就必须实现良好治理。

此前，我简要讨论过总体治理问题，以及特殊利益集团在不惜牺牲其他社会群体的自身利益追求中所发挥的作用。金融部门比其它领域更为明显。这个部门同时具备资源（资金和人力）和营造此类影响的动机；而且它们的政治“投资”至少在美国已经得到回报——通常比其它投资更加丰厚。

这就是为什么在建立包容性增长框架时必须警惕来自金融部门的“忠告”。它们有其自身角度、利益和议程。这种议程并未殷切服务于那些听取建议的国家；它可能更不适用于中国。

例如，它们多年来一直在兜售资本市场自由化的好处——在它们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试图在其 1997 年香港会议上修订章程，以强制各国实行自由化。幸运的是，这项倡议遭到失败，而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资本市场自由化并未导致更快增长，反而加剧了不稳定。最终，甚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在 2008 年危机后改变了其资本市场自由化的观点。

一些人仍然主张在中国实行资本市场自由化，声称这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尽管后面的这种主张一直存在争议，有一点很清楚的是，与资本市场自由化有可能导致的成本和风险相比，货币国际化带来的任何好处都会显得微乎其微。

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

在制定政策框架时，有时会倾向于针对逐个问题和逐个部门进行。这是很自然的：我们是围绕各个领域组建政府部委的，而且在现代社会里，专业知识必然有其专门性。但是，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可能是至关重要的。例如，与资本市场自由化相关的不稳定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和社会后果取决于业已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实力。如果某个银行系统愿意并且能够向中小型企业贷款，就可以更有效地实行结构转型，从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因为旧的就业机会已经遭到破坏。

这就是为什么改革的顺序和节奏会如此重要。有了正确的顺序和节奏，有些改革就能产生更强劲的增长；有了错误的顺序和节奏，它

们实际上会导致收入和福利减少。（这是俄罗斯向市场经济转型失败的原因之一——所谓的市场改革导致了 GDP、生活水准甚至预期寿命显著下降。）

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我担任世界银行（在 James Wolfensohn 行长领导下）首席经济学家时，我们主张制定一个全面发展框架，在这个框架中，各项政策的短期和长期后果以及各部门的相互关系都是可以预见的。

衡量标准

在制定包容性增长政策分析框架时，必须采用新的衡量标准，要超越基于 GDP 评价经济表现的做法。事实上，我曾主持的国际经济业绩和社会进步衡量委员会认为，GDP 是一个糟糕的社会福祉衡量标准，我们可以做得更好。¹⁰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衡量结果会影响我们的行动。

例如，该委员会认为，需要更加关注不平等现象（在所有方面），尤其要关注反映“典型公民”状况的收入中位数，以及贫困和被剥夺状况。它观察到，GDP 统计数字未能充分捕获或者根本没有捕获到诸多重要福祉内容，比如安全和健康。它还指出，GDP 未能充分捕获环境、社会或经济方面的可持续增长数据。在危机发生之前，许多国家的良好 GDP 数据掩盖了其真实经济状况。长期以来，我主张“绿色 GDP”，以纠正自然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现象。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增长尽管仍然良好，但是会有明显变缓。

结论意见

随着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要成功实现包容性可持续增长，就需要一个新的政策框架，注意借鉴其它国家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在引言中，我们概括了一些全球经济面临的严重挑战——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经济不稳定、环境退化（包括气候变化构成的风险），以及私营和公共领域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所有这些都破坏了经济与社会信任度和正常运转。

¹⁰ 该委员会的报告可见：《错误衡量我们的生活：为什么 GDP 背离事实》，J. E. Stiglitz、J. Fitoussi 和 A. Sen，纽约：新出版社，2010 年。中国新华社以简体中文出版。该委员会在经合组织及其“美好生活指数计划”和高级别专家组的主持下继续运转。

在中国还有一些担忧，认为它将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曾经试图解释这并非是不可能的。正如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问题、污染问题以及一直存在的效率低下、不平等、不稳定和环境退化问题，这是政策被误导的结果，而不是自然或经济法则导致的必然结果。

最近的研究已经证明，收入不平等和机会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国家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过去 35 年的显著特点不仅是高增长率，而且是在不平等方面的高增长率，以至于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与先进国家中不平等水平最高的美国相当。中国应该采取积极政策，促进成果和机会更趋平等，如果任由机会不平等现象不断增加和机会平等现象不断减少，将会给中国带来风险。

我所概括的各种挑战不会自行解决；它们不会通过不受约束的市场自行解决。需要在有助于解释这些问题的成因和解决办法的研究基础上制定一个全面的政策框架，将这些问题放在议事日程的优先位置，采用更好的指标来评估我们的解决进展情况。

好消息是，这项研究表明存在很强的互补性：如果我们在解决环境问题的同时实现更具包容性和更能共享的增长，从较为狭隘的 GDP 意义上讲，我们甚至能拥有更加强劲的经济。如果我们避免过度放松管制，实现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更好平衡，我们就可以实现更加强劲的经济和更具包容性的增长。

中国迈向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制定一个政策框架，确保新常态不将现有不平等水平和现有环境状态视为“正常”。我希望本说明概述了一个包容性增长的政策框架，它可以避免步入别国所遭遇的陷阱——这个框架能让中国像应对此前各阶段所面临的挑战那样，有效应对其下一发展阶段的挑战。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中心 A 座 15 层
电 话： (010) 64255855 邮 编： 100011
传 真： (010) 84080850 网 址： www.cdrf.org.cn
责任编辑： 任晶晶 电子邮箱： renjj@cdrf.org.cn
